

● 历史学

略论抗战时期蒋介石改变美国战略重心的努力

韩永利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韩永利(1954-),男,湖北沙市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摘要] 蒋介石试图改变和影响美国“先德后日”战略的努力贯穿于 1941 至 1944 年,是二战中中美关系矛盾的重要方面。蒋介石的这种努力主要是对美国战略投入绕开中国抗日战场客观现实的反应,对于中国抗战有其积极面。但是,由于囿于意识形态观念和依赖外援的政策路线,蒋介石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就只能 是悲剧性结局。

[关键词] 蒋介石;美国;战略重心

[中图分类号] D 829. 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3-0388-06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美关系中的矛盾,与中美战时政府首脑战略观念与实践上的不同有密切关系。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 1944 年中期,蒋介石对美国战略的态度和对策经历了寻求改变、对抗利用、顺从依赖的过程。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一阐释。

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是蒋介石积极寻求改变美国“先德后日”战略,力争战略重心转向远东太平洋地区的阶段。

1939 年 9 月 18 日,蒋介石电告驻美大使胡适表示:“……国际形势至危,若非美国有重要之表示与行动,则英、法在远东势必退缩,我国全处于孤立,而日本所谓东亚新秩序即可实现”^[1](P. 29)。由于各种因素,特别是法国战败,美国安全首先受到来自德国的挑战,其战略注意力和战略物资投入明显偏向欧洲大西洋方面,并形成较完整的“先德后日”战略构想^[2](P. 25-28, 32-34, 43-48)。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蒋介石认为美国偏重对德意作战的战略有转换的可能。他在 1941 年 12 月 10 日的日记中说:“以目前形势而言,英、美在军事上太无准备,且虚张声势,至遭此败,势所必然。但由

世界整个局势与远东战争最后结果而言,反可因之转祸为福。以英、美以后则不能不集中全力先解决远东之倭寇;否则,英、美乃以远东与中国为次要也”^[3](第 3 页)。在这种判断的指导下,蒋介石积极努力使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远东。

蒋介石首先积极推进中美英远东作战整体计划的形成。1941 年 12 月 9 日,蒋介石让宋子文转告美国当局:“……望美国对远东军事速定全盘计划,领导各国,俾得行动一致,力量集中,勿为敌寇各个击破也”^[4](第 43 页)。12 月 23 日,蒋介石又向罗斯福提出召开远东有关各国联合军事会议,以协调相互之间的行动^[3](第 10 页)。根据罗斯福回复,蒋介石在重庆主持中美英联合军事会议,并主张:“倘断定亚洲战区为某一时期最重要之区域,则自当决定战略,予该战区以一切支配之优先权”^[4](第 82-87 页)。蒋介石此言自然是针对“先德后日”战略原则。1942 年初,蒋介石在与澳大利亚驻华公使谈话中,明确赞成“太平洋战争与欧洲战争同样重要的看法”^[4](第 111-112 页)。蒋介石之所以能直接对美国战略提出异议,主要原因是美英在太平洋的溃败和中国战场的相对稳定^[5](P. 141-144)。中国战场除与日本重兵相持之外,还获得长沙战役的胜利^[6](P. 193)。这种形势

强化了蒋介石积极寻求战略重心转换的努力^[7](第 797 页)。

蒋介石此间也主动介入英美远东战略防卫事务,最突出的就是访问印度和出兵缅甸。从战略上讲,印度是盟国战略构架中的枢纽之地。如发生内乱,日本很容易侵入,然后进军中东与德国会师。这将对盟国战略造成巨大冲击,中国也将更加孤立。

1942年2月,蒋介石在新德里与英军总司令哈特莱和印度总督林里资哥讨论中表示:“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使德、日军队没有会合起来的可能”^[4](第 399-401 页)。之后蒋介石又 3 次电令顾维钧转告丘吉尔,敦请英国改变对印政策,并警告:“印度万一动摇,不惟大英危殆则东方战局则全盘失败矣”^[4](第 434, 435, 437-438 页)。2月26日,蒋介石又电令宋子文请罗斯福促使英国改变对印政策:“如敌机轰炸印度或敌军进攻印境,必至人心崩溃一发不可收拾。…印度问题能否合理与应时之解决,乃为太平洋与地中海战争胜负惟一之关键也”^[4](第 439-440 页)。在军事行动上,蒋介石派兵入缅参加缅甸保卫战,不仅为保卫援华路,同时也是积极配合和影响美英战略之举^[8](第二章)。

蒋介石力主建立中美英“永久机构”,争取中国参与美英盟国最高战略决策。1942年2月26日,蒋介石让宋子文向罗斯福表示:“华盛顿英美联合参谋团名称而无中国在内,国人对之皆甚骇异”^[4](第 439-440 页)。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一再不经中国同意就调拨既定的援华战略物资(特别是中国急需的飞机),更使蒋介石感到参与战略决策的急迫。4月19日蒋介石电告宋子文向罗斯福呼吁:“如果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与物资分配机构不能扩大,使中国得以参加,则中国在此战争中只是一种工具而已”^[9](第 74-76 页)。5月9日,宋子文电呈蒋介石:美国仍以先击败德国为主,亚洲战场为次。罗斯福的特使居里也告诉蒋介石:罗斯福的大多数下属重欧战,彼亦无法挽回^[4](第 148 页)。在多番努力没有见效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定向美国和盘托出完整的战略观点,即不同意“先德后日”战略。1942年6月12日,蒋介石致电外交部长宋子文令熊式辉在太平洋作战会议上提出提案,电文说:“……总盼军事会议对盟国整个战略作一确切检讨,接纳我方建议,迅速改变‘先解决德国后解决日本’之战略”,“……如照以往所抱‘先解决德国,则日本即不成问题’或‘日本虽败,而德国仍能挽回形势’之观念证以最近战事经过之事实,实非修正不可”^[4](第 159-160 页)。蒋介石的建议显然与美国军政首脑的战略估计与判断完全不符。6

月15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告知美英年内不可能在太平洋大举进攻,并认为大局已定,无法变更。中国不宜再进行“多方策动”^[4](第 161-162 页)。

蒋介石的愿望和努力是不能实现的。美国战略在太平洋战争之后是做了调整,但是决非战略转移。美国并没有因为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受挫而改变“德国第一”的战略原则。中国战场在美国战略中的位置是:中国必须在援华战略物资既少且不稳定的情况下继续完成全球战略所需要的战略牵制任务。如罗斯福对胡适所说:“至盼中国在各方面袭击,务使敌军疲于应付,不能抽调大量军力”^[4](第 82 页)。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军事战略计划中的表述是:“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10](P. 732-735)。问题在于这种需要中国作出牺牲、付出代价的意向和军事战略计划没有也不可能明确向蒋介石说明^[11](P. 221-222)。显然,蒋介石高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对美国战略的影响。

二

从1942年中期到1943年末,是蒋介石对美国战略消极对抗并加以利用,争取美国战略能“欧亚平行”或“欧亚并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美英太平洋防御战线大致稳定,开始准备实施“先德后日”战略的重要一步,进攻北非和控制中东、地中海区域,完成对德国的“包围链”^[5](P. 195)。此间中国在美国战略中的作用是:第一,牵制日本陆军主力于中国并支持缅甸作战;第二,以中国为基地轰炸日本海上交通线和日本本土。蒋介石正是据此促使美国实施“欧亚并重”的战略。

1942年中期,德国隆美尔兵团在非洲发动猛烈攻势。这种形势使得美英战略决策者下决心实施北非地中海战略,尽早稳固地中海-中东-苏联南部-印度这一战略枢纽区域^[12](P. 221-228, 245-247, 252-253)。6月25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告知罗斯福与丘吉尔第二次华盛顿会晤的中心内容是保持近东^[4](第 164-165 页)。6月26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抽调支持中缅印战区作战的美国第10航空队主力去保卫埃及,并不经中方同意将援华的1个A-29轻型轰炸机中队改派埃及。蒋介石借此机会对史迪威表示不满,认为这是中国战区的不重视^[4](第 215-217 页)。罗斯福迅疾对蒋介石解释:“最近轴心兵力在近东之迅速推进,突使美国面临最危急之局势。……惟此项飞机之拨用,实因局势突变,不得已作临时措置”^[4](第 171 页)。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着重强调的是挽救近东当前紧张局势,这样既可稳住

蒋介石情绪,又能掩饰战略目标取向。7月1日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还对宋子文许诺:“英美不久将有大事可以解除中国之压迫。”由于蒋介石仍然希望战略重心的转移,因此采取静观事态、等待转机的策略。如宋子文7月1日在给蒋介石电文中所说:“……英地中海失败,日敌攻苏,引英美急起对日,与我反为有利也”^[4](第176页)。

这一阶段蒋介石与美国战略关系较为复杂是重开缅甸作战问题。就美国战略要求来说,进行第二次缅甸战役的目的有以下几个相互衔接的方面:首先,可以打通从仰光至云南的交通线,稳定中国战场;其次,可以确保印度的安全^[11](P. 285);第三,可以用较多物资支持以中国为轰炸基地,骚扰和轰击日本在西南太平洋的交通线和日本本土,以支持美国在太平洋的作战^[5](P. 257)。而这几个方面的目的在于稳住东方战线,以利于北非地中海作战。这就产生了一个对中国秘而不宣的隐含因素,重开缅甸作战必须受战略投入的制约。中国既要牵制日本,又要策应缅甸作战^[11](P. 205-342)。

蒋介石开始对收复缅甸作战期望值很高,不仅希望中英南北配合作战,还要求美国派地面部队参加作战。目的在于吸引更多美英军队到远东地区^[11](P. 216)。但罗斯福对蒋介石的回复明确表示了美国军队不能参加中国战区作战^[4](第191-193页)。1942年10月蒋介石要求美国采取更多步骤“维持中国作战之实力”并提出具体方案^[4](第193-194页)。因为担心蒋介石放弃抗战,罗斯福尽力维持对华空运,支持陈纳德的“空中战略”。又以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和支持中国战时和战后大国地位,争取中国战场的保持^[13](第115-117页)。11月,美英成功地实施了“火炬”计划。罗斯福在致蒋介石电中说到:“各种军火之运输,尤其由印运华之军火,在时间上当可格外便利”^[4](第205-206页)。蒋介石巴望中东形势有了转折之后,大规模的全缅作战能开始^[4](第206页)。但是,罗斯福在12月2日给蒋介石电文中仅建议采取有效步骤收复缅甸,允诺在北非战役胜利之后改善援华空运航线,以中国基地空中打击日本,从而避免了对全缅战役的承诺^[11](P. 259)。

1943年1月,罗斯福、丘吉尔致电蒋介石,要求中国“……不仅对于敌人重要航道,并且对于日本本部,能予以打击”。同时明确告知美英将继续对德意发动攻势的战略,希望中国支持缅甸有限作战(即缅北战役)。蒋介石了解了美国对缅甸作战的态度之后,于2月7日致电罗斯福提出加大援华的要求。同时仍希望美英实施缅甸作战的联合作战计划^[4](第

212-214页)。很明显,蒋介石对美国战略不满意又无奈。5月5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决定:暂时放弃南北配合的全缅作战计划^[14](P. 78-82)。这就使缅甸作战在兵力投入上主要成了中方的责任。蒋介石马上做出强烈反应,于5月8日电令宋子文:“坚持缅甸计划必须照北非与重庆会议所决定者实施,非先以英、美海空军遮断敌军接济路线,与确实占领仰光,打通滇缅至仰光全路交通线不可。如果仅占领北缅甸至曼德勒为止,非仅无益于中国战场,而且费力多牺牲大,……中国军队决不能再蹈去年覆辙”^[4](第227页)。蒋介石之所以如此看重全缅作战,是想借助美英军力收复缅甸,进而北上入中国打击日本。这一意图自然与美国战略相左^[15](P. 396)。另外,蒋介石也有难言之隐。为获取更多的援华战略物质,在正面战场的战略部署上,大量军队被用于策应缅甸作战。但是,5月21日罗斯福向宋子文进一步暗示了全缅战役的不可能^[4](第230-236页)。5月22日蒋介石再次做出努力,在给宋子文的电文中说:“如其英、美不用有利海、空军先收复仰光,断绝敌之后方交通,则攻缅计划决无成功之望,……英、美对北非宣言与重庆及加埠决议与诺言,当此北非军事解决后更应执行,决无理由推脱违约,否则以军事信约为儿戏,其将何昭信于世。”为缓解中方情绪,5月26日,罗斯福告诉宋子文: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正研究攻缅登陆作战计划,预计5-6日内完成。蒋介石的希望再起,于5月29日去电宋子文询问全缅作战的具体计划。罗斯福6月4日答复:“所谓缅北、缅南同时行动,如同时进攻,恐非所宜,但至多不过两星期之先后”^[4](第238-247页)。罗斯福的许诺自然又没能兑现。地中海战役胜利,意大利投降后,英国进一步推拖南缅作战。8月25日,罗斯福、丘吉尔联名向蒋介石正式通报了不能展开缅南登陆战的决定。蒋介石仅能维持己见^[4](第259-272页)。

总之,北非地中海战役时期,蒋介石利用缅甸作战问题与美国交涉,期望中国获得与其他战场同等的战略对待。为了大战略的实现,罗斯福采取措施,作出许诺,稳定蒋介石政府,以保证中国战场的战略牵制。可以说,蒋介石获得了某种局部的成果,而争取“欧亚并重”的主要目的则完全失败。

三

从1943年8月美英魁北克会议到1944年中期,是蒋介石被迫顺从美国战略时期。由于中国战场仍可对日战略牵制并可望成为未来反攻日本的基地^[16](P. 132)。蒋介石在顺从中也还尽量争取影响

美国战略

在全缅作战不可能实施的情况下,蒋介石一方面拖延进兵北缅,另一方面接受宋子文的建议,以退为进,即从长远反攻考虑,调整与美英的军事关系。首先争取进入美英战略决策的中枢机构,参加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和军用物资分配委员会。其次,改组中国战区为反攻做准备。蒋介石担任最高统帅,总领战区中美英联合部队^[41](第 262-264页)。但是,蒋介石明显没有估计到迅疾变化的形势将给中国带来的影响。1943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根本改观。德黑兰会议上,美英苏 3 国确定了联合反攻德国的计划,这是完成“先德”战略目标的最后一步^[5](P. 274)。在这种形势下,美国的立场也减少了弹性。在 12 月 7 日连续的几封电报中,罗斯福不仅明确指出欧洲反攻与不能继续缅甸作战的联系,还坚决敦促蒋介石进行缅北作战^[41](第 285-286页)。鉴于大势所趋,蒋介石的回电明确表示了顺从战略的态度:“……首先将德国迅速击败,于中国与联合国或有重大利益,……愿接受阁下之建议。中国战区之危机不仅在于军力之薄弱,而经济之危机更足以影响战时军民心理之动摇,随时可以招致整个战局之崩溃。”美国的援助是“补救中国与太平洋战略唯一缺点之办法。”10天后,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同意缅甸总攻势延期至 1944 年 11 月^[41](第 287-288页)。当然,蒋介石内心并非就赞同了“先德后日”战略。12 月 23 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罗斯福,敦促实施全缅战役,并警告中国战区崩溃“势将影响于太平洋之整个战局形势”^[41](第 291-293页)。罗斯福 12 月 29 日回电实际回绝了全缅作战的要求:只是“同意在华长距离轰炸机根据地急需有足够之战斗机保护”。应提及的是,美国的空中援助给中国战场带来的压力也不容忽视。美国在华空军的战略布局和任务主要是攻击日本海上交通线及日本本土^[17](P. 279-398, 524)。随之带来的问题是,几乎中国的所有重型轰炸机基地都成为了日本强劲攻击的战略目标^[18](第 73-80页)。加上国民党军队自身存在的问题,就更使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防线雪上加霜^[14](P. 398-399)。但是,蒋介石对于罗斯福敦促中国进行缅北作战,仅能以中国是“盟国在陆上轰炸日本本土唯一之基地,……联合国在东亚大陆进攻日本重要之基地”加以对应^[41](第 298页)。颇为现实的罗斯福反而加剧了对蒋介石赴缅作战的催促,并暗示这将影响到对华援助^[19](第 178-180页)。

1944 年 5 月,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的不可抑阻的败势^[20](第 307页)。蒋介石在恳请美国加强第 14

航空队实力的要求遭到美陆军部的拒绝之后,再次呼吁罗斯福实施开罗会议计划^[41](第 320页)。这是蒋介石在困境中争取美国作战略重心东移的最后一搏。9 月 18 日,罗斯福与丘吉尔联合敦促蒋介石在萨尔温江的部队与缅北驻印军配合支持蒙巴顿。只告知“蒙巴顿准备在孟加拉湾发动大规模海、陆攻击战。”前提仍然是:“欧洲战况能容许吾人抽调必要设备时即付实施”^[41](第 311页)。在对美国战略完全不能施以影响,自身又无积极应对之策的情况下,蒋介石就只有在国内战况不佳,且无南缅大规模两栖作战配合的情况下进行北缅作战。美国此时对蒋介石政府态度的变化原因很清楚:首先,欧洲第二战场已经开辟,“先德后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其次,美国东方反攻的主要路线确定在太平洋区域,美国军力和战略物资分配主要投向该地的美国海空军。特别 1944 年 3 月马里亚纳群岛作战之后,美国军方便把对日战略轰炸的重心移到太平洋^[16](P. 475-479)。第三,中国正面战场的失利,结果是极大地减弱了蒋介石与美交涉中的说话分量。

四

蒋介石不赞成美国“先德后日”战略原则与美国战略实际运行中的问题有紧密联系,也与蒋介石本人思想观念、抗战路线息息相关。

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与总体进程考察,美国“先德后日”的战略原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一战略在实施和大体成功的过程中,基本上是以中国付出巨大牺牲作为代价的。美国战略投入重点的运行轨迹是:英伦保卫战及大西洋作战;支持苏联作战与太平洋防御作战;北非-地中海战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和太平洋反攻作战。这些战略投入重点全部绕过中国,但战略的每一步又都离不开中国战场对日本陆军主力的战略牵制。中国战场在“先德后日”战略中的地位,是贯穿于战争始终的战略牵制。中国战场与美国战略战时的这种依存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中国是反法西斯四大盟国中基础最弱之国,无工业能力,战略物资几乎全部依靠外援。但是,在“先德后日”战略之下,比较英、苏等工业强国,中国战时受援最少且最不稳定,承受的战略压力不比其它各大战场轻甚至更艰危。中国除了国内战场的坚持之外,还需按美国战略要求承担中缅印战区的其他战略任务,始终支持和配合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而这些事实,美国军政首脑在处理与中国战略关系时,有意无意地都加以淡化和掩饰。中国在美国战略决策中没有任何发言权。就是在远东太平

洋战线中,中国战场也总是处在保证太平洋战场和印度防线的地位。而这些战略的奥秘,美国一般是对中国方面隐匿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对美国战略的异议是有道理的。特别在太平洋战争初期,蒋介石对美英太平洋防卫战略混乱状况的批评切中要害。中国军队在维持正面战场基本防线之下 2 次出兵缅甸,支持美英挽救战略危局和配合太平洋反攻,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举动。蒋介石在美国战略实施过程中采取的某些抗争行为,也表现出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民族主义观念^[7](第 178 页)。这些既反映了中美之间某些不平等战略关系的事实,同时也反映了中美关系近代历史中从未有过的“平等”状况,这是因为中国有了抗日战争的现实条件。另外,作为谋略家的蒋介石,凭借中国战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实际的战略地位,利用美国战略不能忽略中国抗战的客观现实,以策略手段争取到美国持续对华援助。美国在困难的条件下,维持并逐步增加对华空运物资,除为着美国自身国家利益和战争战略而支持中国抗战原因之外,与蒋介石的争取也不无关系。其积极结果是,中国正面战场在盟国全球战略实施的关键时期没有垮掉,有利于中国战略牵制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从总体上讲,蒋介石不是以现实主义态度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他所反对的是反法西斯战争中正确的战略原则,这就注定了他的努力只能是悲剧性的结局。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演进告诉人们,法西斯是人类文明发展与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这就要求负有时代责任的政治家在政治理念上作出某种超越,或者说暂时搁置意识形态上的争议。美国等西方国家首脑吸取参战前政策中的惨痛教训,终于明确地确立了集中全力首先打败法西斯的政策方向。“先德后日”的战略原则是这种选择的具体体现。蒋介石坚持战略重心移向远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仍然固守意识形态观念的立场。这种立场恰好违背反法西斯战争的客观规律。蒋介石始终把中国共产党视为“心腹之患”,囤重兵封锁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限制中国人民抗战力量的发展。保存实力,希求美国战略重点转到东方,是蒋介石对付“两个敌人”思想的逻辑发展。为使中国所有力量集中于对日战争,牵制住日本军队主力,从而实现战略目标,罗斯福希望中国国共联合抗战:“……消除歧见,更密切的合作,以有利于对日作战的共同目标”^[7](第 728 页)。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也对蒋介石谈到,“对共产党不妨宽待较好。……苏俄已逐渐改变,中共应由新思想者训导之”^[4](第 307 页)。罗斯福自然

不是为共产党说话,而且也有其长远政治考虑。但为了“赢得战争”,他显然希望蒋介石像他一样采取战时的现实主义路线与政策。正由于不合时宜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观念的局限,蒋介石就与支持苏联对德战争和包容中国共产党对日抗战的美国战时大战略始终保持着距离。

其次,蒋介石始终未接受“先德后日”的战略原则,但对美国却有强烈的依赖。这是蒋介石片面抗战路线的必然派生物。这种依赖既反映在蒋介石政府对外援的态度之上,也反映在其战略方针和战场实际状况之中。更为重要的是,依赖外援的战略反过来加剧了国民党政府既有的消极抗战态度,极大地影响了国民党军队及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终于酿成 1944 年的正面战场大溃败^[20](第 446 页)。这样,尽管国民党广大官兵浴血奋战,也改变不了正面战场的总体消极格局。正因为如此,作为中国的战时执政者,蒋介石就很难寻求到处理与美国战略关系的正确途径。随着美国大战略目标的逐步实现,蒋介石抗战思路的负面因素也就暴露无遗。由此,蒋介石影响美国战略的企望和努力,就合乎逻辑的成为历史幻梦。问题在于,美国大战略限制下的对华政策和蒋介石政府战时表现的消极面都极大模糊了人们对中国战场与反法西斯世界战略相互依存关系的认识,使得阐释中国战场实际战略地位问题留有某种缺憾。

好在中国抗日战场是由在战略上起着相互支撑与呼应实际功效的两个部分组成^[21](第 427 页)。而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起着中坚的作用。最值得指出的是,中国近代历史造就了具有世纪眼光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他们制定和成功实践了独立自主的抗战路线和战略,凝聚起中华民族,妥善处理战时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求同存异,以无与伦比的牺牲精神支撑起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伟业,同时也以博大而坦荡的胸怀容纳和赞成“先德后日”战略。这样,中国战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始终支持了反法西斯战争世界战略并在其中占据重要战略地位。1945 年 1 月 6 日,在“先德后日”战略实施成功之际,罗斯福由衷地说:“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22](第 408 页)。这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美国战时领袖客观而无偏见的评价。

参 考 文 献

[1] [日] 古屋奎二. 蒋总统秘录: 第 12 册 [M]. 台北: 中央日报社, 1978.

- [2] MATLOFF Maurice, SNELL Edwin M.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 - 1942 [M]. Washington, D. 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53.
- [3] [日] 古屋奎二. 蒋总统秘录: 第 13 册 [M]. 台北: 中央日报社, 1978.
- [4] 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 战时外交 (三) [M]. 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1.
- [5] JACOBSEN Hans-Adolf, SMITH Arthur L. World War II, Policy and Strategy: 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 [M]. California: American Biographical Center-Clio Press, 1979.
- [6] THORNE Christopher.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7] 吴相湘.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下册 [M]. 台北: 综合月刊社, 1974.
- [8] 时广东, 冀伯祥. 中国远征军史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7.
- [9] 梁敬鐸. 史迪威事件 [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1.
- [10] LEIGHTON Richard M, COAKLEY Robert W. Global Logistics and Strategy 1940 - 1943 [M]. Washington, D. 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55.
- [11] HAYES Grace Person.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 II, the War against Japan [M]. Maryland: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2.
- [12] LOEWENHENM Francis L.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Their Wartime Correspondence [C]. New York: Saturday Review Press, 1975.
- [13] [美] 迈克尔·沙勒.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M]. 郭济祖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14] MATLOFF Maurice.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 1944 [M]. Washington, D. C. :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Army, 1959.
- [15] DALLEK Robert.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 - 1945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16] BUCHANAN A Russel. 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War II,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Documents [Z]. New York: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72.
- [17] ARNOLD H H. Global Mission [M].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9.
- [18] [美] 赫伯特·菲斯. 中国的纠葛 [M]. 林海,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 [19] 赵荣起. 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 [Z]. 台北: 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1978.
- [20] 公安部档案馆.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 [Z].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1.
- [21] 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 2 卷 [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 [22] 关在汉. 罗斯福选集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责任编辑 张琳)

JIANG Jie-Shi's Efforts to Change U. S. Strategic Focus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HAN Yong-li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HAN Yong-li (1954-),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WWII and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bstract JIANG Jie-shi had tried to change and affect American "Germany first & Japan second" strategy from 1941 to 1944 since the American leaders had no will to put strategic focus in the China theater. To a certain extent JIANG Jie-shi's efforts had the positive factors for China Anti-Japanese war, but resulted in tragedy to a great extent because of JIANG jie-shi's insisting in the sense of ideology and the dependence policy on foreign aid.

Key words JIANG Jie-shi;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focus